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王晓玲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合作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化稳定周边国家关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22AZD107)

[作者简介] 王晓玲，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007）

[DOI编号] 10.13761/j.cnki.cn23-1073/c.2023.02.00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前后十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投行”也同样惠及多国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发展形势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传播仍面临一些阻力。

本文的“中亚”指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国家。中亚五国是连接亚欧大陆的走廊，

自古以来既是联通中西的商贸之路，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通道。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使中国与中亚的未来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现阶段，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要使“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耕细作”，增强中亚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合作视角入手，思考如何进一

步推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所谓社会合作视角下的国际合作，是指在国际合作中关注对象国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焦点问题以及重要人群的发展需求，并在开展经济、人文、非传统安全等合作项目时主动回应对象国的社会需求，使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并从中得到“获得感”。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理论优势与舆论阻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生命力所在。在中亚地区，“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平台，高度契合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需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所阐述的“正确义利观”也高度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播过程中受到霸权秩序的阻挠，使得经济合作红利难以完全转化为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这一现象在中亚地区也同样存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优势

相比霸权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全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理论本身更具有感召力。霸权秩序催生了全球范围内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治理危机。由资本扩张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资本全球扩张伴随着霸权主义的延伸，使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不断固化，继而激化了国家间冲突；全球化发展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而全球层面的资源分配却掌握在少数强国手中，霸权国将自身的经济危机输入全球的现象屡屡发生，导致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的单极文化观使不同文化族群难以走向和谐共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以人类共同安全为发展目标，追求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观，追求平等、

开放、包容的合作观，追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多元文化观，追求美丽、清洁、绿色、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正确义利观等新型理念反映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

对于中亚而言，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经济发展计划有广阔合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正确义利观”来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经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2]。“正确义利观”所包含的“搭便车论”“跨期收益论”以及“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的“予取论”都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3]深入宣传“正确义利观”，必定赢得中亚社会对于“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面临的舆论阻力

然而“霸权秩序”仍占据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原子论”视角、“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解释国际秩序。现实主义把国际秩序看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国家在权力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均衡状态；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国际组织、制度安排的作用，但也将国际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视为竞争关系；建构主义提出文化认同能够化敌为友，但这种文化认同不是双向的，是对美欧国家政治制度的单向认同。“霸权

秩序”在经济领域里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在政治领域里表现为强国霸权，在文化领域里表现为欧美文化的单极全球化。

在“霸权秩序”话语体系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威胁论”成为别有用心的集团势力在媒体上重点渲染的主题，内容涉及经济上的“新马歇尔计划论”、政治上的“谋求地区霸权论”、安全上的“债务陷阱论”、文化上的“朝贡体制论”、制度上的“中国模式输出论”、环境上的“污染转移论”等。这些报道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行性，怀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外交辞令。中国学者针对海外民众的一些调查研究发现，经济合作红利未能顺利转化为当地民众对华评价的快速提升。例如，曹玮对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民众的中国好感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经贸合作在提升对华好感度中的作用并不显著^[4]。在周边国家中，韩国与中国经济合作、人文交流规模最大。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18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韩贸易对于韩国GDP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的总和。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的2019年，中韩之间互访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①。然而2019年面向韩国民众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对于韩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被访者仅占32.3%，认为美国最重要的占51.2%^②。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中亚地区的构建也面临相似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通过其强大的媒体影响力以及大规模的公共外交活动影响中亚社会的对华舆论。过去20年间，中国对中亚贸易额增长了24倍^③，成为中亚国家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亚国家重要的外资来源国。然而，部分西方学者把中国塑造成“黑心商人”形象，例如宣扬环境威胁论，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合作项目会破坏中亚脆弱的生态环境等^[5]。中亚国家多通过第三方媒体了解中国，因此产生了对中

国的错误认知，例如认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不够等^[6]。对于本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大多数中亚媒体进行了积极报道，但少数报道也存在着认识偏差。例如，有报道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就是接受中国投资、完成中国订单，并未对当地产生深层次利好^[7]。

综上所述，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使海外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霸权秩序的差异？这也是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所需要跨越的难题。

二、从社会合作视角推动“中国—中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

鉴于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传播中所遇到的障碍，未来可以尝试通过进一步增强海外民众的获得感，以此提升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曾经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④。有学者指出，持续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将有助于解决中国和平发展中所面临的“近而不亲”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主要通过推动大型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标志性项目的建设，后续性投资与配套措施部分存在相对滞后的现象。其结果是项目本身体现了政府层面的合作，一旦出现政府或领导人更迭，这些项目的

① 资料来源：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金兴钟以及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在“中韩建交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

② 资料来源：www.asaninst.org/contents/tag/????/。

③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3019182259846457&wfr=spider&for=pc>。

④ 资料来源：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106466892418081669&item_id=8106466892418081669&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

示范效应就会打折扣。这种合作对于提升东道国民众对华认同、促进“亲诚惠容”而言作用有限^[3]。还有学者指出，公共外交需要绕开霸权秩序语境中的国家利益与软实力理论，发展有邻邦当地特色的公共外交议程，直捣当地社群的深层忧虑^[8]。这些讨论都关注对外合作的社会效应，反映的正是社会合作的视角。

从社会合作角度入手开展对外合作，有助于深入阐释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是资本在全球的逐利与扩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均衡共生，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反对资本的权力异化，批判经济系统对社会文化系统的支配，主张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规训和限制资本，寻找经济与社会、自然的发展均衡点。第二，倡导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其实是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对立、文化冲突指出了解决方案。当前，美国以价值观差异为界在全球扩大同盟阵营，其本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激烈的身份政治冲突向国际社会蔓延的表现。而经济分配、社会均衡发展话题有助于缓解当今国际社会日益激化的身份政治对抗，走向多元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实践是对理念最有力的阐释。民众的亲身参与以及获得感有助于破除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怀疑。增信释疑最有效的路径是带头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引导各国民众都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中去。第四，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减贫成就以及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最有力的宣传。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在全世界蔓延，日本人竹内亮的纪实采访以普通人的视角向世界展示武汉的防疫措施以及疫情中武汉人的日常生活，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

理解和认可。2021年，在人文交流被新冠疫情阻隔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上有关李子柒和云南大象的短视频吸引了全球民众的眼球。前者通过记录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后者通过记录大象途经之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自然风景、经济发展成就和环保意识。

中国与中亚的社会合作具有良好的“硬件基础”，“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适合从社会合作视角来开展。第一，中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地区，很多着眼于“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在中亚顺利完成。中国与中亚五国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哈萨克斯坦已经成功搭建了涵盖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的全方位联通网络，正在致力于打造横贯欧亚、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大动脉”。中国与中亚的4条天然气管道都经过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得益于“互联互通”，乌兹别克斯坦正从“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①。这种联通将给中亚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既有的全球经济合作以海洋为纽带，90%的全球贸易通过海洋完成，80%的GDP产出来自沿海1百公里地带^[9]。而“互联互通”使中亚商品能够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也能够更加快捷地走向欧洲，使中亚成为全球重要的商贸枢纽，这必将为中亚社会提供脱贫致富的机会，广泛惠及中亚民众。有“互联互通”作为基础，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人员、货物流动畅通无阻，中国的很多社会发展经验更容易在中亚地区付诸实践。第二，中国与中亚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亚的能源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在不附加任何政治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向中亚提供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这种强互补性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① 经贸合作“实打实、沉甸甸”，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30年增长100多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108648741489171&wfr=spider&for=pc>

提供了强劲动力。正因为如此，建交30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增长了100多倍。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40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在中亚运营的中资企业累计达到7700家^①。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大多在中亚展开，以此为依托，中国与中亚的社会合作就有了落脚点。第三，中国与中亚五国政府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政治互信，社会合作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国与中亚五国分别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展开了全方位合作，取得了令各方满意的积极成果。图库曼斯坦虽然不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但也一直与上合组织保持密切联系。2022年以来，“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不断深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中亚五国间的政治互信。

三、现阶段中亚地区的主要突出社会问题

现阶段中亚的社会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民生类问题，例如失业、贫困、环境污染等；二是族群、宗教类问题，表现为被称作“三种势力”的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三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法制建设、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相对滞后，民众对社会公正表现出质疑^[10]。

（一）中亚存在就业不足与贫困问题

中亚五国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单一、就业不足现象。近十年来，除吉尔吉斯斯坦之外，大部分中亚国家都持续保持了良好的GDP增长态势。但是，中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偏重于“油气”，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少。“油气”产业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都对中亚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冲击。与此同时，中亚人口却处于快速增长期。1991年独立前中亚地区总人口为5076.03万人，2017年

突破了7000万。2025年预计中亚人口将达到7822.26万人，2030年为8197.25万人^[11]。由于就业岗位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中亚国家采取限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特别是向首都流动的措施。传统游牧和绿洲经济所需劳动力有限，不能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有效缓冲地。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聚集在大城市周围却难以就业，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容易滋生极端宗教思想和犯罪。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则选择去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邻国就业。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在俄罗斯打工的人数有70多万人，侨汇收入占吉尔吉斯斯坦GDP的30%，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2019年公布的失业人数为10.3万人^[10]。跨国就业加剧了中亚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劳动力流出引发了空心化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存在较高的贫困率。2017年到2019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率分别为25.6%、22.4%和20.1%，塔吉克斯坦的贫困率分别为29.5%、27.4%和26.3%^②。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把塔吉克斯坦列入最落后的低收入国家，把吉尔吉斯斯坦列入中低收入国家^[10]。中亚地区长期以来面临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美国和西方国家也不断通过中亚的社会组织施加政治影响。这样的外部环境降低了中亚社会的结构韧性，失业率和贫困率的高企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二）中亚国家尤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教育资源匮乏

教育资源匮乏限制了年轻人的就业、阻碍了产业升级。不仅如此，多种海外教育资源大量流入中亚，竞争性地吸引中亚的年轻人。俄罗斯对

① 经贸合作“实打实、沉甸甸”，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30年增长100多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108648741489171&wfr=spider&for=pc>。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于中亚的媒体和文化市场具有强大影响力，与中亚各国的教育合作较为密切，通过“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人文合作署、戈尔巴乔夫公共外交基金会等大规模文化交流基金持续推动与中亚五国的文化交流。20世纪90年代以后，突厥—伊斯兰文化、欧美文化对这一地区年轻人的影响力相对上升。中亚五国独立后，土耳其等国凭借突厥—伊斯兰文化纽带与中亚国家展开频繁的文化互动。典型案例是土耳其通过“葛兰运动”在中亚建立了大量学校。起源于中东的“葛兰运动”探索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实现西方科学与伊斯兰伦理道德的融合，目前在中亚设立了几百所“葛兰学校”，覆盖小学至大学教育。85%的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把子女送入葛兰学校读书，吉尔吉斯斯坦政权中的精英的40%~50%都毕业于葛兰学校，几乎所有政治家、企业家、文化和社会活动家的子女都在葛兰学校就读。“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西方文化随着全球反恐合作大量进入中亚地区。国际开发署、罗斯基金会、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康拉·德登纳基金会、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歌德学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等诸多来自欧美国家的机构与中亚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美国与中亚积极开展高等教育合作，并且明确声称以培养中亚民主改革领袖为教育目标^[12]。中亚年轻人的文化多元化有利于中亚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交流，但也使中亚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变得非常复杂，对于中亚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构成挑战。

（三）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

传统农业与游牧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脆弱，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还使得中亚农村无法像中国农村在经济转型中灵活吸纳和提供劳动力，消解产业转型中的阶段性突发性危机。中亚地区存在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严重的问题。阿姆河和锡尔河流经中亚多国最终注入咸海，其流域几乎与整个中亚地区重合。中亚各国围绕咸

海流域的分水和水污染治理问题产生了诸多矛盾。中亚咸海的干涸不仅影响了中亚地区民众的健康和生产、生活，而且还对周边气候产生影响。水资源不足不仅阻碍中亚各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也是国家间冲突的导火索。不仅如此，美国、欧盟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跨界河流治理为借口介入中亚地区事务^[13]。

（四）国际恐怖主义曾经严重干扰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英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 Global Terrorism Index）显示，近年来中亚五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在减少，但塔吉克斯坦的恐怖主义指数依然较高，从2019年到2021年依次为5.182、4.584和3.988^①，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五国需要始终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需要通过区域性合作预防国际恐怖主义回流。

四、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合作建议

过去十年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中亚搭建了坚实的合作平台。未来中国与中亚的合作要绘制“工笔画”，使“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今后中国与中亚合作可从以下六方面入手，进行进一步优化。

（一）把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社会共同发展作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之一

社会合作可以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点合作项目为落脚点，由中国企业和当地社会共同推进民生项目、环境保护项目、教育合作项目，将“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打造成社会合作的试点区域。在思考和讨论中国与中亚的各领域合作时，不仅要关注双边贸易规模以及能源合作，更要关注涉及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项目合作。除了关注各领域合作的整体经济效益，还要

^① 数据来源：英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6/GPI-2022-web.pdf>）。

注意提升民众在各个合作阶段的“获得感”。经济合作项目可以关注就业拉动效果、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等；文化交流项目可以以普通民众、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展开，注意提高普通民众的参与度。

(二) 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教育合作

中国和中亚的教育合作除了要在数量方面进一步提升，也要在质量方面有所突破。相比美欧，中国与中亚国家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弱。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80%的公派留学生都选择去美国和欧洲留学^[14]，美欧在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短期内难以超越的，年轻人首先选择赴美欧留学的现象也难以短期内得到扭转。为了吸引中亚的优秀青年了解中国，使其具有全球多元的均衡视角，中国高校可以为具有美欧、俄罗斯等地留学经历的年轻人再次提供来华留学、考察、开展客座研究的机会。除了精英教育，中国和中亚的教育合作还应该重视职业教育，并将职业教育与中国在中亚的企业经营活动相结合。日本面向中亚的产业、行政、文化、教育等部门实施人才培养援助项目，在中亚设立“日本人才开发中心”，培养国际通用型人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5]。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曾提议与阿富汗、中国合作建立“阿富汗公民培训教育中心”，培训语言、能源、铁路运输和服务业等不同领域的技术人才。这些案例都说明中亚社会对于中高等技术教育有浓厚兴趣。

(三) 将均衡发展、脱贫、绿色发展作为现阶段中国—中亚合作的增长点

这三个主题是中国与中亚社会都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目前已经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中亚推广中国的脱贫经验，可以使更多的中国和中亚民众通过欧亚联通而受益。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导致中亚社会发展不均衡、水资源消耗高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农村地

区开展了生态示范农场等项目，通过风能、电能、电力网建设减少中亚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获得了积极的社会评价。这种合作既有助于中亚农村“脱贫”，又有助于环境保护，同时还可以推动中国与中亚的农业贸易合作，带动职业教育合作和农业、环保科技合作，是中国与中亚社会合作的新增长点。

(四) 强化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吸引更多的中亚学者特别是年轻人成为“中国通”

目前中国与中亚间的智库交流日益活跃，但交流形式以论坛为主。未来可以增加中长期的共同研究，这将更加有利于双方学者建立起合作网络，共同深入思考本地区的发展经验、探讨本地区的发展道路。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与中亚学术界可以尝试从三个方面加强交流合作：设立独立的研究基金，鼓励学者们从本区域视角出发开展研究；增加客座研究机会，鼓励拥有各种学科背景的优秀学者到对方国家开展教学和研究；推动中国与中亚优秀学术期刊间的相互认证，促使中国学术界里的“中亚通”和中亚学术界里的“中国通”积极融入对方的学术话语。

(五) 强化社会层面的交流，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地参与民间交流

目前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人文交流仍需的亲力和吸引力方面得到提升。从社会合作的视角出发，未来中国与中亚的民间机构应该更多地参与双边与多边人文交往中，建立起不受短期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的长期交流合作机制。政府可以更多地承担引导、监督、危机处理的角色。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中方可以更多地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中国、中国人的故事，同时也向中国人介绍中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文化。

(六) 共同应对地区治理危机是社会合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打击极端恐怖主义活动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的执法部门、宗教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在

防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的防疫卫生部门建立起了信息共享、联合防疫的合作平台。未来，中国与中亚可以围绕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联合防疫等区域性问题的建立长期化的联合治理机制，并着力宣传合作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王毅.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J]. 求是,2020(15).
- [2]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 [3]李向阳.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9).
- [4]曹玮. 中国公共外交有效吗? ——基于2005—2012年六国民众好感度的时间序列分析[J]. 国际政治科学,2015(3).
- [5]耿捷.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亚跨界河流治理研究[J]. 学术探索,2020(12).
- [6]唐小松. 论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公共外交[J]. 教学与研究,2018(2).
- [7]刘琴,朱晓军,王炜.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主流媒体对双边经济合作报道研究[J]. 文化与传播,2020(5).
- [8]石之瑜. 邻邦——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真实挑战[J]. 公共外交季刊,2010(4).
- [9]王义桅.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的价值观[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
- [10]孙壮志,等. 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三十年[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11]高焯迅. 中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思考[J]. 北方论丛,2020(2).
- [12]马强. 大国在中亚的“软实力”政策比较分析[J]. 俄罗斯学刊,2019(12).
- [13]耿捷.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亚跨界河流治理研究[J]. 学术探索,2020(12).
- [14]秦海波,李莉莉. 中国对中亚的公共外交:现状、挑战与方向[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7).
- [15]刘洪宇,高文胜. 日本对中亚国家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援助及其对华启示[J]. 新疆社会科学,2022(1).

[责任编辑 李睿思]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Central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operation

WANG Xiao – ling

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s put forward, i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positive respon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it has also encountered challenges from the established hegemonic order. In Central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Central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area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ut it still needs further efforts and enhanc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hina – Central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mong the Central Asian people. This study ponders the path to further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Central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operation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ttention can be focused on livelihood needs such as employ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cooperation efficiency can be improved by exploring forms of interest to the public, especially for young people; continuing to improve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alent pool in Central Asia and deepening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guiding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non – governmental exchanges actively and orderly;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o deal with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Key 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cial Cooperation China – Central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